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由来及中国的对策

王俊峰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可持续发展”既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也是人类对自然界一个全新的理性认识。然而人类这一认识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再到“可持续发展”。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认识上的进步与升华。中国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战略目标和基本国策,无疑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抉择。

关键词:认识论;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2-0023-03

Sourc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es on Our National Policy

WANG Jun-fe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mode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new rational cognition of human towards nature as well. But the processes of this rational cognition have been very long and complicated, which has gone through from “Human Centralism” to “Nature Centralism”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ach step of the processes is the greatest progress on which human mad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human and nature. Undoubtedly, mak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trategy goal and the essenti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by our government is decision standing for keeping with the era.

Key words: theory of cognition; human centralism; nature central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1]。“可持续发展”既是人类社会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也是人类在如何协调人与自然问题上一种全新的发展观。这一全新的发展观的形成,是人类对现代工业文明理性反思后而得到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一个新的飞跃与升华。然而人类这一理性认识的形成,却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本文拟从认识论的角度探求“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的由来,谈谈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与对策。

一、人类发展观之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或曰人类中心论,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以人为核心的观点。无论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在日益恶化的环境迫使下对自己观点有所修正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主张以人为本,行为的出发点是人,行为的目的是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向自然索取或者更好地索取。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只有人类才有资格获得伦理关怀。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其道德地位优于其他物种,其他存

在物都无内在价值, 仅有工具价值。

人类中心论的产生有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古希腊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家苏格拉底提醒人们“认识你自己”, 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这些哲人旨在唤醒人的自我意识, 实现统一世界中的主客体分化, 但同时却种下了“人类中心论”的基因。欧洲在经历了中世纪漫漫黑夜的痛苦爬行之后, 迎来了人性焕发的文艺复兴时代。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 把人自身置于整个存在的核心, 从而使一切非人的存在统统沦为从属的手段和工具。这构成了人与自然相疏离以至最终走向敌对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根源。文艺复兴时代和 18 世纪启蒙思潮及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所确立的“经验自我”、德国古典哲学所确立的“理性自我”和“先验自我”奠定了人类自我中心化的理论根基。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 则使这种人类中心论的思想在行为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工业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 商品经济的广泛社会化和科学通过技术手段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市场逻辑, 极大诱发并空前地强化了人的欲望, 而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则为人类欲望满足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和措施。人类的贪欲与技术广泛应用的结合、统一, 共同规定了现代人戡天役物的价值取向。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工业化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行为准则和实践理念。不可否认, 人类中心主义在唤醒人类的主体意识、摆脱自然对人的束缚、使人类从原始的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然而, 当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极端之时, 必然导致对自然规律的无视和肆意的掠夺。其结果必然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未来发展的尴尬。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由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 人类中心主义被认为是导致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

二、人类发展观之二: 生态中心主义

生态中心主义, 或曰非人类中心主义, 将人视为与自然平等的存在, 否认人类的特殊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自然的核心地位。以动物权利/解放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和深层生态学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作为这些运动的成果, 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 再从动物扩展到植物和所有生命共同体, 进而扩展到大地、岩石、河流乃至整个

生态系统。“大地伦理”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中一种最为“激进”(此处的“激进”是指, 由于“大地伦理”相对于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而言, 其对人类要求更为苛刻。前两者分别承认动物、生物的权利, 而“大地伦理”原则将此范围扩大到了包括无机界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环境伦理观念, 其提倡者阿尔多·利奥贝德(Aldo Leopold)强调: 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大地都应该获得人类的尊重。“大地伦理使人类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为其中的普通成员和公民。它蕴涵着对它的同道成员的尊重, 也包括对共同体的尊重。大地伦理简单的扩充共同体的边界, 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 或者由它们组成的整体: 大地。于是, 大地伦理反映了生态良心的存在, 依次反映了个体对大地健康义务的确信。健康是大地自我更新的能力, 保护是我们了解和保持这种能力的努力。对于我来说没有对大地的爱、尊重、赞美, 和对它的价值的注意。当然我所说的价值是某种比纯粹经济价值更宽广的价值: 我所说的价值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3]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 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有内在价值, 动物、植物、物种, 甚至河流、岩石、生态系统及自然本身都具有内在价值, 它们也是道德共同体的成员, 是否具有理性和是否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并不能成为“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 生物、物种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伦理调整的范围, 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由伦理原则调节和制约的关系, 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至所有的存在物, 人类由自然的主人变为自然普通成员和普通公民。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从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到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 这是一种在世界观转变下的自然观的发展, 这种转变和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生态中心主义所主张的“道德应包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是从人际伦理学到环境伦理学的革命。伴随着这场变革, 人们经历了一个逐渐摆脱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物种歧视主义枷锁的过程。正如一些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样, 当代生态运动与废奴运动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个多世纪前人们为解放黑奴而战斗, 今天环境主义为了解放大自然, 废除对地球的“奴役”而奔走呼号。这种新的伦理观彻底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 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化

价值观念。

生态中心主义所提倡的自然“内在价值”，对于强化人们的环境意识，增强行为主体的道德自律、规范主体行为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承认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人们会形成对自然的尊重和爱护，滋生必要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减少过分干预自然、破坏环境的行为。通过从传统的实用主义自然观发展到视自然有“内在价值”的自然观，使人们在道德上、行为上更加尊重自然，积极主动地呵护自然。这对于强化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意义重大。

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的支撑发生了转变，是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种新的认识境界。当然，生态中心主义也有其理论上的不足：第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都未能摆脱“中心”论的传统思维模式。并且，生态中心主义从“自然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否认人的主体性、特殊性，势必陷入认识论上的误区。第二，生态中心主义以自然的“内在价值”为其理论的核心，但是，关于自然的“内在价值”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自然的“内在价值”存在与否，对自然的“内在价值”应该如何评判等问题，都存在着争论。第三，生态中心主义看到了人与生物、物种、自然之间的不平等，却未能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真正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当他们在强调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时，却忽略了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三、人类发展观的理性反思： 可持续发展

鉴于上述两种发展观的理论缺陷，传统的发展模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是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迫使人们不得不以一种现实的态度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探求在人类发展中如何融科学、道德、审美为一体，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能有一个新的和谐与统一。于是“可持续发展”这一全新的理念便应运而生了。

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兴起了以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世界各国时兴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了一股从来未有的增长热。但是随着工业高度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资源匮乏等问题，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人们越来越关心这种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担心地球和人类的未来。于是，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把发展科学技术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怎样把人类生活需要的内在尺度与生态环境规律的外在尺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人类利用自然的科学性与道德性，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人类开始正视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样的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将它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对于这个概念，许多发展中国家与许多发达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辩论，终于在1989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第15届理事会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前需要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其中包含：子孙后代的需要，国家主权，国际公平，自然资源，生态抗压力，以及环保与发展相结合等重要内容。经过全体联合国成员国的共同努力，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地球问题首脑会议，指定并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等文件，号召各成员国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加强合作，予以落实。

四、中国的对策与措施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短缺、经济基础和技术能力还非常薄弱的国家。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社会全新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经济建设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提出采取有力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可持续发展放到了特别突出的位置，上升到战略高度。并为实施这一战略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

1992年6月，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上，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的庄严承诺。1994年3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下转第29页）

法地买卖。排污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自主地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选择买入或卖出排污权。排污权交易的特点在于，它兼有成本效率和环境质量保障的优点，是排污费或排污税以及行政管理手段所无法比拟的。

四、结 论

(1)环境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一般属性，由于消费中的非排他性以及非竞争性，导致发生“市场失灵”。政府或公共部门的介入虽可弥补“市场失灵”，但同样由于环境资源的自然特点，仍可能发生“政府失灵”现象。

(2)与一般经济资源不同，环境资源的不可分割性不仅导致它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负的外部性，同时，环境资源也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如环境效益)。治理制度不仅要使负的外部性内部化，还要考虑如何使正的外部性内部化。

(3)环境治理活动的制度创新，应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特征出发，一方面追求产权明晰化，尽量减少产权安排中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还应从环境资源的

生态属性出发，建立相应的环境产权，如排污权等。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可持续发展词语释义[M] . 北京: 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7.

[2] Pigou, A . C . . Economics of Welfare (4th edition) [M] . Macmillan, London, 1932.

[3] Coas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3, (3) .

[4] 萨缪尔森, 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十六版)[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5]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 Science, 162, 1968.

[6] 张五常. 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7] Y.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M]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8] Bromley and Hodge.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presumptive policy entitlements: Considering the Premises of rural policy.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0, 17.

(上接第 25 页)

1995 年 9 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 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实现良性循环”。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一再重申: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综上所述, 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抉择过程。可持续发展虽然是人类在关于发展模式上形成的一种全新的认识, 但要使这一观念为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人认可和接受, 真正落到实处, 还须一番艰苦不懈地努力。其中最关键的是从传统的认识误区中走出来。一是要抛弃盲目乐观的“人类中心主义”, 因为这种认识会导致人们违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 一味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 一方面贪婪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 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抛洒废物, 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类支配自然力量失去控制, 造成生态环境的崩溃。二是要改变消极悲观的“生态中心主义”, 因为这种认识的致命缺陷在于否认人的主体性, 其结果必然是扼杀科技进步, 停止发展生产, “返朴归真”, “回到原始状态去”, 重过古代田园

诗般的生活, 导致历史的大倒退。“可持续发展”之所以是人类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关键就在于它把科学、道德、审美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理顺了科学性与道德性的关系, 使人与自然达到了真正的和谐与统一, 在这全新的理念下, 人类既不要像古代那样作自然的奴隶, 也不要像工业革命以来那样作自然的敌人。而应该作自然界的朋友, 爱护自然, 培育自然, 建立起人与自然全面和谐的关系, 以利于我们星球繁荣和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 中国面对新的时代特点, 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基本国策, 无疑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抉择。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实施这一发展战略,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能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A] .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C]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 宋原放. 简明社会科学词典[Z] .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

[3] Leopold Aldo. A san county almanac[M]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